

百年「未名」一脉相承

台静农的红色启蒙与两岸文化担当

浓厚

在做《皖西日报》记者时，常到皖西各地去看看。退休后很少有机会到乡镇去了。不过近几年因参与六安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编辑出版《六安文化名人丛书》工作，为与中共叶集区委宣传部合作编辑出版丛书《台静农全集》《韦从芜文集》而到叶集几次，在工作之余逛了叶集城区。除原镇政府办公地的老街与20年前相比变化不大外，遵照现代规划建设规划的纵横交错的宽阔道路两旁绿树成荫，高楼鳞次栉比。

今年11月26日，中国现代文学馆与安徽省文联在北京联合举办了“纪念未名社成立100周年座谈会”。这一由国家级和省级多家权威机构共同主办的纪念活动，不仅是对“未名”精神的传承，更是对未名社先贤的崇高致敬。

百年沧桑，文脉流芳。回望一个世纪前，在新文化运动的激荡浪潮中，鲁迅先生以其深邃的眼光与炽热的文化担当，携手一群怀抱理想的青年，创立了未名社。它不仅是文学创作的园地，更是思想启蒙的阵地，更是思想启蒙的生动实践。“未名”二字，寓意深远，象征着不务虚名、踏实耕耘的品格，也寄托了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期许。

在众多未名社先贤中，台静农先生的生命旅程，尤为生动地展现了这种精神如何穿越时代巨变，在另一片土地上生根发芽，最终成为连接海峡两岸的文化血脉。他的一生，紧密交织着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核心命题：在启蒙与救亡中塑造现代民族精神，在裂变与融合中守护文化主体认同。

“未名”之光——新文化土壤中的扎根与成长

要理解台静农先生在台湾的文化事业，必须追溯其精神源头——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及其催生的“未名社”。1925年，鲁迅先生于北京发起成立未名社，聚集了台静农、韦素园、李霁野、韦从芜等一批怀抱理想的青年。他们多数来自安徽叶集，被后世并称为“未名四杰”。未名社远不止是一个文学社团，它是在新文化运动激荡下，一代知识分子“探索民族新生、呼唤精神觉醒的生动实践”。鲁迅曾将他们的翻译工作喻为“运输军火”，足见其寄托之重。

在此氛围中，台静农迅速成长为社内核心的小说家。他深受鲁迅现实主义精神滋养，其创作“从内容到风格，皆师法鲁迅”。他的文学成就，集中体现于短篇小说集《地之子》与《建塔者》。鲁迅先生曾高度评价，在更多人争写恋歌悲歌之际，“能将乡间的死生、泥土的气息，移在纸上的，也没有更多，更勤于这作者的”。他的笔触深入中国乡村的肌理，以冷峻沉郁的笔调，描绘封建习俗的残酷与社会动乱的灾难，笔下世界充满了深挚的悲愤之情。这种对底层苦难的深切凝视与对黑暗现实的犀利批判，正是未名社关怀现实、启蒙民智精神的核心体现。与此同时，台静农还根据身边共产党人的斗争事迹，创作了歌颂革命志士的《建塔者》，热情讴歌殉道者的理想。

青年台静农身上已熔铸了“未名”精神的多元维度：对人民的深沉关爱、对社会不公的尖锐批判、对光明理想的执着追求，以及甘为文化播种的奉献精神。这份在启蒙与救亡中熔铸的深沉关怀与坚韧品格，仿佛一颗精神的种子，为他日后在完全陌生的历史风土中，承担起更艰巨的文化使命，埋下了伏笔。

渡海薪传——历史峡谷中的坚守与重建

1945年台湾光复，结束了日本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。然而，殖民者留下的最深重创伤，不仅在于物质掠夺，更在于精神与文化的异化与断层。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的“皇民化”运动，其终极目的是“彻底剥夺台湾人的民族主体性”，迫使台湾民众在语言、姓氏、信仰、习俗上全面“日本化”。至光复时，中文的母语地位几近丧失，中华文化传承面临严峻危机。在此历史峡谷的严峻时刻，文化上的“去殖民化”与“中华文化重建”，成为关乎民族认同存续的紧迫任务。

正是面对如此深重的文化断层，以台静农为代表的大陆文化人赴台，堪称一场“文化急救”与“精神归航”。1946年，台静农应台湾省编译馆馆长、鲁迅挚友许寿裳先生之邀赴台。这绝非一次寻常的教职迁徙，而是一次肩负着特殊历史使命的文化出征。他先后任职于编译馆与台湾大学中文系，并长期担任台大中文系主任，成为这项历史性文化重建工程的中流砥柱。

他的贡献是多层次且根本性的。首先，是在教育体系内系统性重建中华学术传统。在台大中文学系，他主讲中国文学史、古典文学及文字学，其治学严谨，溯经史，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学与学术体系，重新植入台湾高等教育的心脏。他参与编纂《中文大辞典》，助力奠定台湾地区中文学术规范。其次，是以人格风范与艺术修养进行潜移默化的文化浸润。台静农为人温厚谦冲，在书法、篆刻上造诣极深，将中国传统的文人艺术与审美精神，作为一种活生生的文化实践，传递给学生与社会。

然而，文化的传承并非总在阳光下进行。赴台后，因早年与鲁迅及左翼文学的密切关系，台静农身处复杂环境之中。他的挚友许寿裳因宣扬鲁迅精神而遭害，更使其处境微妙。然而，外在的沉默并未熄灭其内心的文化火焰。他将早年的社会批判激情，转化为对中华文化精义的深沉讲授与学术阐发。这种“从呐喊到沉潜”的转变，并非退缩，而是将“未名”精神的担当，以另一种更为持久、更契合时代境遇的方式践行——即在文化的根基处默默培土，耐心等待民族意识的新生。正是这份“沉郁豁达”，使他能历史夹缝中，最大限度地保存并传递了文化的薪火。

精神之桥——跨越时空的当代价值与回响

从北京到台北，台静农用一生行走，完成了一座“文化桥梁”的构建。这座桥，不仅连接了地理上的海峡，更连接了文化的断层与民族的认同。他的生命轨迹，构成了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：从北京未名社的新文化启蒙，到渡海后的台湾文化重建。这条脉络超越了地理与政治的隔阂，彰显了中华文化强大的内生凝聚力与知识分子的主体担当。

他的文化实践，为台湾光复后的文化重建注入了正统、深厚的学术之源。他所参与奠基的台大中文系学术传统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学人，使得中华古典文学与研究在宝岛得以系统传承和发扬。因此，他被誉为“在台湾地区新传中华文化的大陆赴台文化人士的典型”。更为深刻的是，他成为连接两岸共同历史记忆与文化情感的关键符号。在他的故乡安徽叶集，已建立台静农纪念馆，并以“未名”命名湖、路、广场，将其精神融入地方文脉。这条由台静农及其学术艺术所构成的“纽带”，实实在在地“连接两岸乡情”，促进两岸两岸的文化交流与心灵契合。

在今天，台静农及其所代表的“未名”精神，具有多重当代价值：其一，它是抵御“文化台独”与历史虚无主义的精神资源。台静农等先贤在台湾地区的奋斗史，雄辩地证明了光复后台湾文化重建的核心是“去殖民化”与“中华文化复兴”，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承有着清晰的历史主轴。其二，它启迪我们思考全球化时代文化主体性的守护。昔日的“皇民化”与今日形形色色的文化渗透，本质都是对本土文化主体性的侵蚀。台静农先生深耕经典、滋养根本的实践，提示我们民族文化的自信与传承，需要沉潜的功夫与坚毅的定力。其三，它彰显了知识分子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的永恒情怀。无论时局如何变幻，台静农始终将个人学术与艺术生命，融入民族文化的存续与发展之大业中。这种不务虚名、脚踏实地、将个人价值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品格，是跨越时代的精神财富。

从未名社的乡土呐喊，到台湾大学的经典传薪，台静农先生用一生行走，完成了对“未名”精神最深刻、最完整的诠释。纪念未名社成立100周年，不仅是对历史的追忆，更是对一种深沉的文化担当精神的召唤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，我们需要继承的，正是这种将个人才智无保留地奉献于民族文化遗产的赤子之心，这份在时代巨变中守护文化血脉的孤勇与智慧。台静农先生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文化的根脉深植于民族的共同土壤，精神的桥梁能够跨越最宽的海峡。他们当年播下的种子，已在两岸生生不息；他们当年点燃的灯火，必将永远照亮中华民族共同前行的精神航道。

皖西文化名人

E-mail: 48221941@qq.com

黄璜同志与叶集

徐元华



晴空下的叶集无名湖大桥。彭松 摄

者因工作关系，为知情者之一，理应将此事告诉叶集同志。黄璜同志在1983年3月任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，之前曾先后任中共六安地委常委兼霍邱县委书记、六安地委副书记。喜欢深入基层、联系群众，善于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使他叶集镇十分了解。叶集地处皖豫交界、大别山北麓、史河两岸，俗称“安徽西大门”和大别山门户。明清时期商贾云集，设有陕、晋、赣、鄂、豫、皖六省商务会馆，且有深厚的文化底蕴。40年前的叶集镇是皖西四大名镇之一，霍邱县叶集区政府驻地，全镇面积不到3平方公里，只有12000余人。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拂下，如何让这个地杰人灵的地方尽快繁荣富强起来？黄璜有他独到的见解。在他任省委书记后的第一个春节（1984年）的前夕，就到六安开展调查研究。在皖西宾馆与一些通讯社、报社、广播电台的记者交谈时，就谈到建设像叶集这样的集镇的意义，“在于促进商业贸易发展，带动加工业、服务业的发展；还可以给附近的专业户提供施展才能的场所；促进科技、信息的交流，活跃文化生活”。他当时还向记者们介绍了建设叶集镇的想法，期许经过几年努力，“将叶集建成一个小城市”。这在当时就引起记者们的兴趣，表示要跟踪报道。一年过去了，建设叶集的想法，在叶集是否得到落实呢？一年来叶集有哪些发展呢？他在1985年春节借送黄树勋同志到六安地委赴任书记机会，

于2月22日和省委组织部长、秘书长、地委领导同志一道到叶集察看。笔者遵地委宣传部长指示，随行采访。

在叶集镇党委会议室，黄璜刚坐下就对叶集镇同志说：“我们省委几位常委和地委的同志给你们拜年来了。你们这里是皖西重镇，是我们省西出的一个窗口，祝愿你们年年有新的发展。”镇党委书记汪永祥在汇报时谈到，1984年遵照省、地、县委的有关指示，叶集采取一些措施欢迎各地各界人士到这里来开商店，办第三产业，做生意。目前除本省一些县市的人要来，外省也有人愿意来，每天流动客商达到千以上。叶集按照规划开辟了农贸市场，还准备开辟山货、小百货等专业市场。霍邱县委书记王明荣补充说，叶集的商品零售额超过县城。有一位叫叶炳代的个体户，在叶集靠贩卖组扣，一年赚6万元，向国家缴税金3000元。这时，黄璜介绍了浙江等地活跃市场的情况后说：“向你们讲这些，听起来新鲜，可在外面，人家都办起来了”。

在汇报会上，黄璜等领导同志饶有兴趣地听取了叶集同志的汇报，不时与他们交流，赞扬他们的成就，肯定他们的做法，鼓励他们再上一层楼。黄璜一再强调，要把叶集搞繁荣，从叶集是皖西重镇的实际情况出发，要走以贸易促工业，靠商业贸易致富的路子。这就要进一步放宽政策，欢迎外国、外省市、外县和各行各业到这里来开店办厂。这只是一头，光有这一头还不够；还要有另一头，这一头是农村中的能人、专业户，欢迎他们进来做生意，办第三产业。刚才讲到的那位做组扣生意的个体户，可以划一块地方出来，请他牵头搞一个组扣市场，专门出售各种各样的扣子。我们这次来就想谈，对叶集要考虑建成未来的一座城市，这个方针定下来，搞个规划。要动员镇上各行各业、各界人士，包括中学教师，都来考虑

怎样把叶集搞繁荣。包括叶集的学校，能不能办个大专学校。说大学，你们皖西就一个六安师专，看了寒碜，再办一个大学怎样，可以考虑吗？规划制定好后就要脚踏实地地去做，年年要有新花样，一年更比一年好。请县里开个会，对叶集放宽政策。从哪些方面放宽政策呢？县里在镇上的企业可不可以放给镇上？财政实行包干怎样？基建审批、人事管理、干部奖励等等，请县委、县政府认真研究一下，搞个文件。黄璜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我们的干部要学会与外面谈判、做生意。叶集历史上能人多、聪明。能否选两三个人开展对外经济联络工作？还要在史河两岸栽些树，搞成风景区，也有利于保护叶集”。

之后，霍邱县委、县政府遵照省、地有关文件，于1992年2月撤销叶集区公所，将原叶集镇的柳树乡、平岗乡、南街办事处、北街办事处合并建立叶集镇，镇政府驻叶集。1993年9月，省委、省政府批准叶集为全省唯一的综合改革试点镇，实行地区计划单列，享受县经济管理权限，扩大自主权。此后又被国务院计划发展、改革等11个部委批准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。试点从体制、机制上为叶集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，促进叶集经济快速发展。经过6年努力，叶集经济实力增强，城乡面貌明显改观，纵横交错的小城镇框架基本形成。1998年12月，经省委、省政府批准，成立了叶集改革发展试验区，管辖范围扩大到孙岗乡、三元乡，行使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，享受综合改革试点点的有关政策待遇，直属六安地委、行署管辖。2015年10月，经国务院批准，设立了六安市叶集区。2016年8月，经省民政厅批准，霍邱县姚李镇、洪集镇划归叶集区管辖。就这样，在各级党委、政府的关心、支持下，勤劳的叶集人民勇于进取、埋头苦干，终使黄璜当年“建成小城市”的设想变成了现实。

皖西红韵 铁血丹心

——皖西红四方面军强将名人的红色回响

胡遵远

众所周知，红四方面军于1931年11月7日在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宣告成立；鲜为人知的是，安徽省皖西地区作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，不仅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诞生地，更与这支队伍有着血脉相连的深厚渊源，可用“三地一乡”精准概括。

皖西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诞生地。1931年11月7日，红四方面军在红安七里坪成立时，下辖红4军第10、11、12师和红25军第73师。在这4个师中，第11师和第73师的主要源部队在皖西，第10师中也含有较大成分的皖西红军。1932年6月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入极盛时期，红四方面军已发展为2个军、6个师，新增的红25军第74师、75师均诞生于皖西大地，皖西是红四方面军苏家埠大捷的发生地，是红四方面军实施西征战略的重要决策策源地。1932年9月27日，金寨燕子河会议作出方面军主力南下英山、再向麻城地区转移的部署；同年10月，黄柴畈会议最终决定实施外线作战、启动西征，红四方面军主力由此撤离鄂豫皖苏区，皖西更是红四方面军强将名人的故乡。

洪学智

开国上将洪学智，金寨人，1934年11月升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。曾先后两次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，是我军现代后勤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人，有关他的战斗传奇、辉煌人生，几乎是家喻户晓。他是我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唯一一位被两次授予上将军衔的将军。

皮定均

皮定均，金寨人，曾任红4军第12师35团2营政治教导员。解放战争时期，他任中原军区第一旅旅长，率部掩护主力突围，孤军奋战、顽强拼搏，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任务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。1955年授衔时，毛主席念他中原突围有功，在授衔名单上挥笔特批“皮有功，少晋中”。

杨国夫

开国中将杨国夫，叶集人，

1934年被提升为第30军第270团团长。在直罗镇战役中，他率领1个连负责警卫毛主席的安全。战斗紧张时，一股敌人向毛主席的指挥位置冲了过来。情急之下，杨国夫一边留下3名侧卫土卫身警卫毛主席，一边率警卫连从敌人侧面的悬崖上突袭来犯之敌，最终配合主力消灭了这股敌人。

徐立清

开国中将徐立清，金寨人，1933年6月，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，后任红四方面军卫生部部长、卫生部政治委员，是全国闻名的“三让”将军（让级别、让职务、让军衔）。毛主席称赞他是“我党我军的好同志、好干部”。

方子翼

开国少将方子翼，金寨人，曾任红30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，1937年下半年进入新疆航校学习，成为第一批驾机升空的红军战士。在抗美援朝战斗中，他指挥空4师共出动飞机400余架次，作战500多次，击落击伤包括美国“王牌飞行员”乔治·阿·戴维斯驾驶的敌机88架。空4师由此获得“空军第一师”殊荣，并受到毛主席的嘉勉：“空4师奋勇作战，甚好甚慰。”

汪乃贵

开国少将汪乃贵，金寨人，曾任红4军第10师、红30军第90师、红30军第89师师长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他率领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3营夜袭阳明堡飞机场，打赢了129师出师抗日第一仗。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人物志》共收录人物2511人（团级以上干部），其中安徽皖西籍人物390人，占总数的15.53%。这其中，既有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，也有历经千辛万苦最终迎来革命胜利的人民功臣；既有被评授星章的开国将军，也有名扬神州的名将人物。

杨朝礼

杨朝礼，金寨人，1933年7月起，相继担任红31军第92师、红9军第27师、红9军第25师政治委员等职。1937年3月，在甘肃省临泽县梨园口作战中英勇牺牲。像杨朝礼这样，牺牲在鄂豫皖、川陕革命根据地，牺牲在长征、西征途中的皖西籍红军战士不计其数，仅在梨园口战斗中牺牲的皖西籍烈士就有曾任红30军89师师的邵烈坤（金寨人）、曾任红30军医院院长的徐其新（金寨人）等。在2016年央视大型公益寻人节目中，94岁的老红军、杨朝礼的勤务员梁天深情地讲述了杨朝礼关心他、爱护他，关键时刻把生的希望留给他的感人故事。

林英安

林英安，金寨人，曾任红四方面军第31军91师政治委员，第31军政治部主任，川陕省军事指挥部副指挥长兼西游游击指挥长。1934年10月，在四川

广元郭家坝战斗中英勇牺牲。后来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为褒扬林英安，将其牺牲所在地更名为“英安县”。

廖赤见

廖赤见，金寨人，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妇女宣传队队长，1936年10月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团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。年底，率副团前往永昌二十里铺为红9军慰问演出时，途中遭遇强敌英勇牺牲，年仅21岁。

说起红四方面军的名人，人们自然还会想起汪荣华和林月琴这两位著名的元帅夫人。汪荣华，裕安人，曾任红4军第12师卫生所医务人员、四川省妇女部巡视员，1936年与刘伯承结为夫妻。她的一生不仅为党、为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，而且与刘帅一起共同培养出4位将军。林月琴，金寨人，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兵营营长，1937年与罗荣桓结为夫妻，是我军第一位“女大校”。

廖永和

廖永和，金寨人，是一位非常有传奇色彩的人物。曾任红30军89师269团2营营长等职，随军西渡黄河后，1937年春，在倪家营子战斗中左腿受伤。后来，他在石洞内住了40多天，又在饥寒交迫、险象环生中流落塞外10多年，直到1949年才回到党的怀抱。解放后，他在青海省工作，相继担任过区长、县长等职，出席了党中央召开的“七千人大会”。离休后，廖永和终于回到了他朝思暮想、魂牵梦绕的家乡——金寨。

从红四方面军中走出的皖西籍强将名人还有很多很多，比如：“百战将军”张贤约、“飞虎将军”肖全夫、“军工先驱”张尚祥、用“三寸金莲”走完万里长征的周玉文……可谓举不胜举，数不胜数。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，让我们向英雄的皖西方面军及其广大将士，向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皖西籍先烈们，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！

红土地

E-mail: 48221941@qq.com